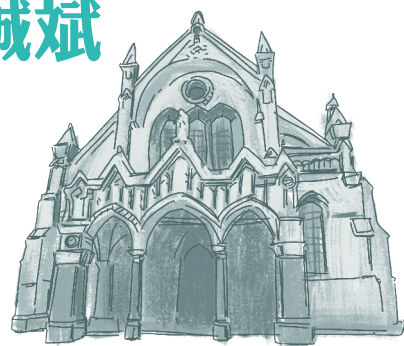


# 首位華人主教： 天主教總堂與徐誠斌

夏其龍、李佩華



## 前言

本文旨在呈現天主教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1920－1973）於上世紀 60、70 年代服務社會和教會的歷史。位於港島中區半山堅道的天主教總堂早在 1888 年建成。到 1946 年，天主教香港教區正式成立；堅道的總堂成為香港天主教教區的主教座堂。徐誠斌成為第三任正權主教時（任期為 1969 至 1973 年），亦是香港天主教的第一位華人主教。60、70 年代伊始，湧入香港的內地難民逐漸落地生根，徐主教一方面承接教會一直所做的救濟工作，另一方面則回應難民第二代在生活上的迫切訴求，遂創造出社會保障和教育等大業。

本文將從個體及社會面分述，前者以徐誠斌的成長、學歷、心靈歷程、社會承擔、教會職務等作為路徑，顯出徐主教是一位有作為、並為時所用的人。後者通過教區的難民救濟事務，及延展出來的教育福利和政治等表現，牽動大公教會「梵二精神」，重申天主教由下而上的教會觀，強調本地化及社會公義。由於本地教會所推行的善業，

體貼時代的需要，因而奠定了堅道天主教總堂在香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位置和意義。

## 一、堅道與天主教總堂的交響

本節的時空點，可分作三點描述——中環半山的堅道、堅道 16 號的天主教總堂，以及上世紀 60、70 年代的香港社會與教會。

### 中環半山堅道

堅道位處港島半山區，是一條歷史悠久的主要道路。1840 年代，即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堅道已被開拓，當時稱為山頂馬路。與它平行的主要道路，上有羅便臣道和干德道，下有荷李活道和皇后大道。「堅道」名字的由來，與威廉·堅（William Hull Caine, 1799－1871）有關。1841 年，威廉堅出任香港政府的首任裁判官。他建立警察隊，兼辦監獄事務，也曾負責坐落於奧卑利街的域多利監獄，正好與堅道毗鄰。

堅道（Caine Road）在未正名前稱為「山頂馬路」，英文字譯音為「Shun-ting Ma-low」。雖被稱為山頂，但可以推測最初所謂「山頂」的概念，其實地理位置不算很高，因為後來有洋人搬至比「山頂」更高處居住，堅道一帶便被改稱為半山區。由於該區擴充了居住環境，昔日堅道的街號曾於 1934 年間被重新編排。

最初的堅道是洋人社區，毗鄰住宅都是花園洋房。1861 年，有

\* 此篇章的圖片為 © 天主教香港教區版權特許編號 HKCDA-053/2019，經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准許複印。

一份工商名錄內載有道路的中文名稱和譯音，方便洋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轎作為當時的交通工具，其設計簡單，只有一張供兩人抬的藤椅。轎夫會在路旁招徠生意，等候客人，而樓梯街便成為他們上落半山的主要幹道。於是，中環區山上住洋人、山下聚平民，這樣以人種分區居住的情況並不難理解，因為一般平民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入住花園洋房，故形成貧富隔離的現象。後來，逐漸也有一些華人遷入半山區居住。

### 堅道 16 號天主教總堂

堅道 16 號一帶曾有「小梵蒂岡」的綽號。由堅道 2 號開始，附近一帶分別有天主教總堂、教區中心、高主教書院、明愛中心、聖心書院、宏基國際賓館、嘉諾撒醫院。昔日，道明會及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會院，亦曾先後設於堅道。在教會發展的最早期，教堂是用草蓆架搭成，<sup>1</sup> 後來在中環威靈頓街 60 至 76 號與砵甸乍街交界的山坡上，興建第一間教堂，此乃聖母無原罪聖堂。

聖母無原罪聖堂於 1842 年建成。1859 年，教堂不幸付之一炬。原址重建後不久，因鄰近環境不再適合宗教聚會以及教友人數增多等原因，教會便購地另建新聖堂。<sup>2</sup> 1881 年，教會購入一幅名為鐵崗 (Glenealy Estate) 的地方，<sup>3</sup> 即現時堅道 16 號，以重建教堂。教堂的建築材料包括磚石和花崗岩，象徵永久性和優越。<sup>4</sup> 堅道的聖母無原罪聖堂於 1888 年完工，當時的署理港督亦有到場參與觀禮。

聖母無原罪聖堂的建築，由倫敦一間建築公司策劃。設計上採用



昔日的堅道 1 號



昔日的堅道 27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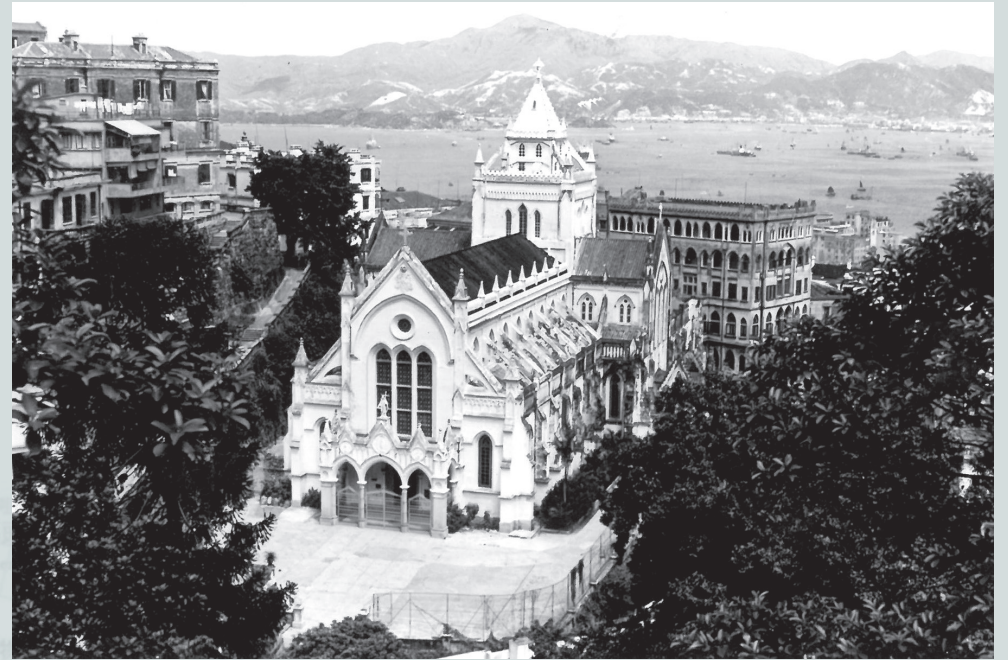
昔日的堅道 29 號



仿歌德式建築風格 (neo-Gothic style)，<sup>5</sup> 建築外形呈一個十字架。最初，總堂有一座鐘樓，比總堂還高。日戰時鐘樓被拆，諷刺地，原材料熔鑄成炮彈。從前教堂的左側有一道橫向的門廊可讓人進出，而正門廊中的大門則在慶節時才打開使用。教堂的牆壁用石塊及磚所建成，兩旁均有拱壁。刻在柱上的是捐款者的姓名牌匾。由於當中不少是葡萄牙人，<sup>6</sup> 故教堂又被稱為「葡萄牙廟」。<sup>7</sup> 祭台的西南面有主教寶座，在牆壁和石柱上有聖人的造像。今天的聖母無原罪總堂中央之尖塔，是在 1950 年代加建。到徐誠斌主教的年代，祭台被搬置到中央地方，鋪蓋雲石地板，下面收藏教會先賢的遺骨，祭台上有尖塔和十字架，取代了從前的無原罪聖母像。<sup>8</sup> 此外，教堂內部有尖拱、肋拱、風琴、聖人畫像和彩色玻璃窗等，另內置四座小教堂。<sup>9</sup>

1946 年，天主教香港教區正式成立，聖母無原罪聖堂因而被改稱為主教座堂（即：天主教總堂）。<sup>10</sup> 主教座堂的拉丁語字根「cathedra」，意為「座位」，代表着主教的座位就在於此；而此詞又來自於希臘語「kathedra」（「καθέδρα」），是由「kata」（向下、監視）和「hedra」（座位、椅子）兩字組合而成，象徵一個地方行政官，所以主教的工作是管理一個教區。<sup>11</sup> 主教座堂內設有主教專座，以及放置現任的主教牧徽。本文主角徐誠斌主教在任時，他的座位上鐫刻有其主教牧徽，並寫上「誠悅事主」四字，意即誠心誠意悅樂地事奉天主。牧徽座右銘之下角，是港島景色，象徵他有着兩個不同時代和文明之交替匯聚的特質。

堅道天主教總堂在歲月中提煉出一個文化符號，盛載着特殊的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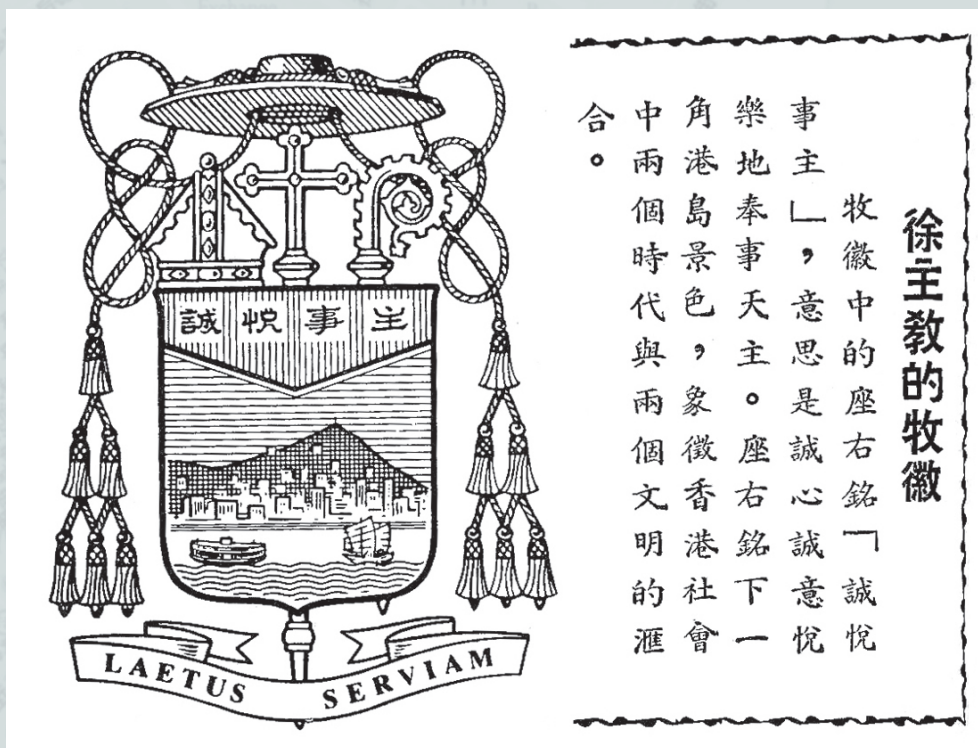


堅道總堂之早期建築和地理環境



昔日總堂的內部建築





徐誠斌主教的牧徽

史及文化意涵。由最初在威靈頓街的小規模聖堂，演變成今天莊嚴地屹立於堅道的主教座堂，這座教堂與香港社會共同經歷了百多年的滄桑變化，成為了本地極重要的文物建築之一：1990年被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評定為一級歷史建築，<sup>12</sup>更獲得2003年度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優良獎，極富宗教及文化價值。<sup>13</sup>

### 上世紀 60、70 年代的香港社會和天主教會

19世紀中葉，當天主教在香港建立教會時，古老及當時新興的修會都前來發展，包括方濟會、道明會、本篤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米蘭外方傳教會、法國沙爾德的聖保祿女修會、嘉諾撒仁愛修女會等。這些修會立即拓展社會服務及教育工作。戰後，其他修會，如耶穌會、慈幼會、瑪利諾會、安貧小姊妹修會等，接踵來港，投入社會，支持勞工、老人等服務。<sup>14</sup>20世紀50至60年代，受國內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影響，引發內地難民湧入香港，造成本地龐大的社會救濟需求，包括醫療和教育。<sup>15</sup>1966年春天，人人懼怕文化大革命蔓延到當時的殖民地香港，並對生活構成威脅，社會一度出現恐慌，九龍更發生一連串嚴重治安事故，形勢惡劣。然而，正在服務大眾的修會團體不願撤離香港，繼續愛德服務，堅持留下來與貧苦大眾共渡難關。<sup>16</sup>

60年代後期，香港經濟開始發展，但治安、教育及社會問題亦隨之而生。香港政府還沒有足夠的意願去承擔社會各項基礎建設，而各項社會福利措施尚未完善之際，堅道天主教總堂背後的羅馬教廷召開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掀起空前的改革，<sup>17</sup> 教會內出現一股革新潮。一連串鼓勵加強本地化、呼籲正義等主張，為香港教區提供了參考，並為 70 年代的發展路向，帶來了重要的理念和願景。教區白英奇主教（Bishop Lorenzo Bianchi, 1899–1983）更主動提出香港教會應由華人掌管。徐誠斌因而獲得重任帶領天主教香港教區，開始建樹教會及社會的年代。

在梵二改革的氛圍下，教會的神父、修女和教友全力以赴，配合整個教會的更新和意志，加強向社會廣推慈善服務，輔導病人和垂死者，服務青少年罪犯，參與公民運動倡議改善社會及經濟政策；亦有為弱勢如艇戶、小販、「水上新娘」發聲向政府申訴；有的選擇為草根基層服務，有的走進工廠工作和避風塘跟艇戶生活；<sup>18</sup> 有幫助窮苦者自給自足，發起儲蓄互助社計劃；<sup>19</sup> 也有因應社會的需要，發展學校、醫院及社會服務中心。

## 二、隨梵二改革平行而奏

徐誠斌於上海出生，學識淵博，中英文造詣非凡，閱歷豐富。1936 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新聞。<sup>20</sup> 1942 至 1944 年，擔任重慶英國大使館出版處翻譯員及國立復旦大學英文系講師。他曾負笈英國牛津，修讀英國文學，並於 1945 至 1947 年，出任牛津美頓學院講師。1948 至 1950 年，任職南京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1950 至 1955 年，為東南亞英國總專員辦事處的高級研究員。

29 歲時，徐誠斌從基督新教轉為天主教徒。35 歲的他決志委身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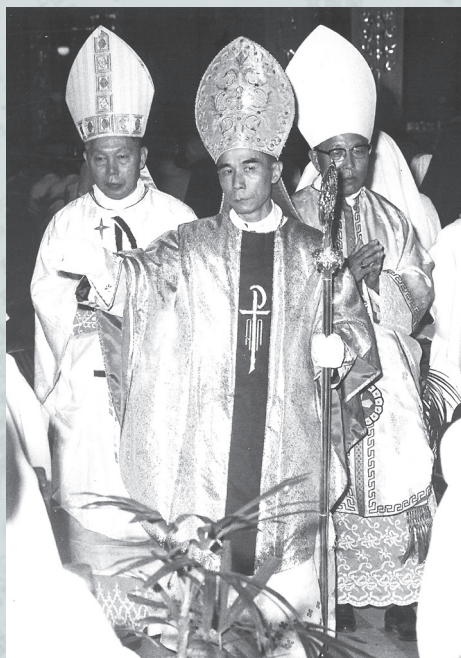
會，遂放下教授工作，<sup>21</sup> 於 1955 年往羅馬宗座伯達學院修讀神哲學，立志成為神父。四年後，在羅馬晉鐸，升為神父，回港服務，從此展開他在教會改革氛圍下的教會事業。最初他在《公教報》及公教真理學會擔任主編，後來出任公教進行社社長、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秘書。<sup>22</sup> 1967 年，他被委任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翌年，出任教區署理主教。1969 年，時年 49 歲的他，奉委為教區第三任主教，出掌香港天主教，成為香港首任國籍主教。

徐主教就任後，以梵二改革為主軸，致力為教會展開全方位的改變。以下略枚舉若干特點來扼要說明：首先，在教會內首推禮儀改革，旨在促使一眾信友在生活中表達並昭示基督的奧跡，以及教會的純正本質（《禮儀憲章》2）。他修訂本地的天主教禮儀，也幫助完成華語的新訂禮規。<sup>23</sup>

其次，梵二提出教友要為教會貢獻自己的優長，使教會內彼此相通，在統一的氛圍內共謀圓滿（《教會》教義憲章 13）。徐主教遂在教區成立及發展人事委員會、籌組聖經協會、司鐸代表議會、牧民議會等組織，廣納不同身份的教會人士參與。他又召開香港教區會議，商討教會的使命、傳教、宗教自由以及關注其他宗教等議題。

其後，1973 年，全球聖公會最高屬靈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藍賽博士（Arthur Michael Ramsey, 1904–1988）訪港，<sup>24</sup> 徐主教以積極推動與新教各宗派對話的精神與他會面，以示基督宗教內的合一友好。在社會層面，徐主教積極介入福利職務，從 1968 年起，出任國際天主教福利會亞洲區副會長、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的主席等。<sup>25</sup>





1967年祝聖典禮後，徐主教在羅光總主教及杜寶晉主教陪同下，降福觀禮的教友。



1973年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藍賽博士訪港，徐主教陪同參觀堅道總堂。

除了在制度上帶來改革，徐主教於1970年促成了本地教會有史以來一件盛事——他費盡心思，安排教宗保祿六世來港。這事件意味着傳統天主教的突破，教宗的形象不再是教會高高在上，反而有個人的親和風範。這反映梵二改革不僅在制度上推動，還有在神職人員個體的行動和態度上均實踐出由下而上的精神。然而，教宗訪港的事件卻存在不少枝節、惹人眉角，要求徐主教以高度的智慧去解決。原因是那一年海峽兩岸在聯合國上的形勢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在國際上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承認，而中華民國卻保不住國際地位。當時，台灣有位徐主教的同鄉，並曾令他在教會方面有所啟蒙的方豪神父反對教宗訪港。他認為香港作為殖民地是中國人之痛，不應邀請教宗訪問；亦擔心教宗對共產黨政權有任何友善的舉動。面對台灣教會的反對，徐主教顧慮到台灣教友的心情，私下向方神父解釋，也公開表示教宗訪港是基於香港教區的教友人數是全球華人教區之首，只順道作三小時的宗教性訪港，並於香港政府大球場主持彌撒後離港。<sup>26</sup>

### 三、社會公義的鐸聲

港英政府管治初期，採取的政策是由志願機構各自開展不同的社會服務，以回應社會福利之需求。在1966至1967年發生社會動亂後，政府才有所改變，大力發展香港社會福利。此時，徐誠斌主教以梵二的方針，把教會向外拓展，延伸到社會各階層，具體參與香港社會的發展。他掌管的香港教區，在推動社會福利、教育及社會價值這三方面，均有顯著的成就。<sup>27</sup>

在徐主教任職前，教區的福利事業已成雛型。教區成立了「天主教社會福利會」作為教會的福利救濟組織，後來改組並參加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 1961 年正式改名為「香港明愛」。明愛承先啟後，把教區的福利事業制度化，而徐誠斌亦被稱為香港明愛的四大功臣之一。<sup>28</sup> 香港明愛是香港教區最重要的社會服務機構，在 1953 年由華德中神父（Charles Herman Vath，1909－1974）所創辦。這個愛德機構從一個小規模的志願者團體，<sup>29</sup> 發展到擁有超過 4,900 名全職員工和萬多位義工支持的一個重要社會服務機構。通過其二百多個服務單位，提供的服務涵蓋教育、醫療、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和接待服務等。<sup>30</sup> 在徐主教領導下，明愛獲得當時港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1915－1988）的肯定。

在教育建設方面，徐主教應對香港教育服務的不足，提供教育機會予學童。當時社會有眾多適齡入學的兒童，他們對學習的需求遠超過政府所能提供，教會便協助肩負辦學的社會功能，包括發展天台學校、夜校、成人補習班，以協助市民重獲應有的教育機會。教會更使用了原先興建教堂的資源來興建學校，所以出現學校禮堂兼舉行教會禮儀的情況，即學校地方平日作上課之教學用途，到了週末便用作教堂聚會。據統計，在 1967 年有 221 所天主教教會學校，到 1973 年在徐主教任內，增加至 289 所，學生人數也由 18 萬增至 25 萬。可見教會舉措有適，令社會大眾受惠。

在教育界的個別事件而言，徐主教曾就教師薪酬紛爭，全力協助斡旋。事緣港英政府在 1971 年 2 月宣佈調低新入職文憑教師的起

薪點，<sup>31</sup> 文憑教師薪酬運動隨即發生。羅富國、葛量洪和柏立基三間教育學院的學生會對此起薪點不滿，認為會分化在職和新入職文憑教師，亦矮化教師的尊嚴，於是發起抗議行動，與港府展開談判。<sup>32</sup> 在職文憑教師於是群起反對，並成立 13 個教育團體和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其主席為小學校長司徒華。<sup>33</sup> 秘書處先後召開文憑教師大會，策動三輪教師罷工，其中一輪在升中試日當天進行，以示強烈不滿。<sup>34</sup> 當時，徐主教應司徒華的邀請去協調他們與政府之間的談判，政府最終作出讓步。<sup>35</sup>

1973 年 4 月 29 日的文憑教師大會上，徐主教表示教師與其他行業人士一樣，有權為爭取合理的要求而罷教，但他亦勸說不應杯葛升中試，因為受影響的不是政府，而是數以萬計要升中學的無辜學生。<sup>36</sup> 徐主教也表白，因為教會學校為數不少，故他感到應站出來為教師作調解，<sup>37</sup> 他表示最困難的是事件之雙方未能互相諒解，因為政府恐怕答應教師的薪酬加幅會觸發全面性的加薪要求，而教師則認為政府漠視他們的訴求。徐主教不諱言教師們當時未有與公眾作好溝通，讓外界了解他們的處境，以致未獲得社會普遍的共鳴，而申明教師所說政府歧視教師專業，亦並非事實。徐主教表明他相信教師其實是不難溝通，只是政府有官場的因循作風，故未能跟教師們認真地對話。<sup>38</sup>

徐誠斌主教不辭辛勞去斡旋，會晤港督，並與司徒華等人及中小學校長教師等會面，為的是社會安民及莘莘學子的利益。<sup>39</sup> 他在調解教師薪酬事件中所作的貢獻和熱忱，在後來 13 個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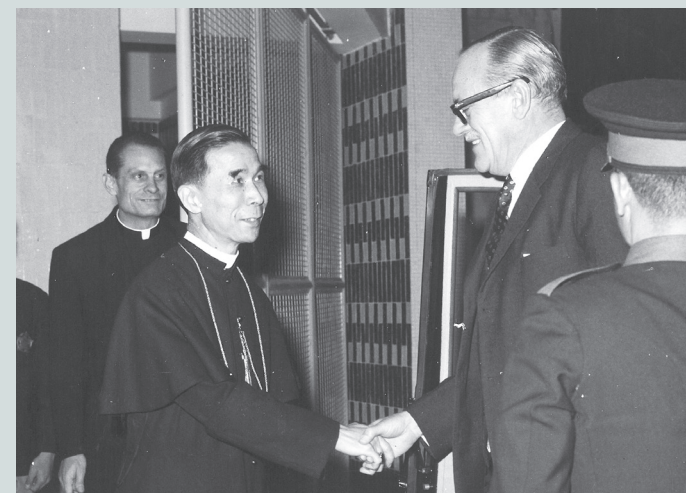


發表對他的悼文中，可見一斑：

徐主教為調解薪級事件，奔走斡旋，作出卓越貢獻。我們藉此切身了解到：他不但是一個具有偉大愛心的宗教家，而且十分關懷香港教育前途，對改進教育懷着殷切的期望和無比的熱忱，他是教師們的慈祥長者和至誠朋友。我們曾經得到他寶貴的指導。<sup>40</sup>

在社會價值方面，徐主教在1970年召開了教區會議。他在《香港教區會議文憲》內，有多項建議：在「教會的社會使命」中，提議每年都發表一份改革的社會宣言，以供政府參考；建議教區成立反貪污諮詢委員會，以助道德方面之重整；成立研究中心，研究娼妓問題；策劃社會正義年，由專家根據社會訓導來講道；各堂區成立社會小組，解決該區的社會問題等。<sup>41</sup> 教區當時已意識到基督徒不應只注意社會現狀，更要不平則鳴，主動地去改善大眾的生活，所以教會內的社會小組，也不要只討論問題，而要有真正行動去實踐教會的社會訓導，像徐主教發起成立出生權維護會，以反對墮胎合法，強調基督徒要正視生命價值。<sup>42</sup> 本着天主教普世大公的宏觀，徐主教亦很關心其他地區，在1971年聖誕時，他呼籲教友協助賑濟印度飢民。<sup>43</sup> 當菲律賓、巴基斯坦、越南等地有賑災運動時，他又會呼籲教友盡力去襄助。<sup>44</sup>

徐主教曾經為政府突然執行死刑上的程序公義問題而念茲在茲，且含鬱而終。那是一件發生在1973年與撲滅惡行有關的案件。當時政府為殺一儆百而改變政策，<sup>45</sup> 要處死殺人犯蔡國昌。在囚犯將被行



1970年港督戴麟趾爵士參觀明愛，徐主教與力理得神父迎迓。



1973年徐主教呼籲教師撤銷杯葛升中試



刑前，徐主教與宗教和法律界共 71 人，上書到英國外相，<sup>46</sup> 以法律程序的不公義為理由，要求赦免蔡國昌的死刑。他們認為該事件的爭論點不在於應否給予罪犯重新改過的機會，而是在於審理公義的原則問題。因為自 1967 年 11 月，政府已經赦免了 30 個死囚，<sup>47</sup> 但為着達到殺一儆百的阻嚇效果，要處死本來也可能獲赦免死罪的蔡國昌，故涉及程序上的不公義，亦欠缺一個釐定嚴重刑罰的公義、客觀之標準，令人質疑如何解釋第 30 個和第 31 個死囚之間的幸與不幸。徐主教等人認為政府應先作鄭重的公開聲明，讓人清楚知道犯重罪會受死刑，方為公允。<sup>48</sup>

最終，雖獲英女皇頒令特赦，但卻引起當時一些香港人的誤解，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更以「假慈悲」來責難徐主教。<sup>49</sup> 對假慈悲之評語，徐主教雖認為難堪，欲據理力爭，遂致函予其時的《明報》社長查良鏞，欲借刊登以釋除公眾的誤解，但可惜徐主教驟然離世，該文的刊登便成為了對他的悼念。世易時移，香港於 1993 年正式廢除死刑，以終身監禁作為最高刑罰，反映當日徐誠斌主教藉蔡國昌事件為寶貴生命所伸張的社會公義，是一件殊為可貴的事情。

## 結語

巍巍矗立在港島中西區堅道的天主教總堂，與香港共度百多年的歷史光景——殖民時代、97 回歸、香港主權移交 20 周年等。它由前身坐落於中環威靈頓街的小聖堂，至遷址到堅道，後隨天主教香港教區成立而正名為主教座堂，成為半山區的一個宗教及文化標記。

這座建築物，現今處於大廈叢林中韜光養晦；人們不能再從維多利亞港見到它的蹤影。但曾管治主教座堂的歷代人物，他們的精神仍支撐着香港社會，不會被淹沒。徐誠斌主教座位上的牧徽，顯示了他的宗教情操，亦綜合了他服務社會的精神。

他短短的人生，卻展現了其偉大的胸襟，為香港的教育、福利事業孜孜不倦地勞碌；為提升香港教會的國際地位，克服困難，他邀請教宗保祿六世來港，更成為香港國際盛事。他所作的每一件事，都為後人留下值得景仰的理由：斡旋於文憑教師與政府間的薪酬紛爭，避免學生直接受到影響；為死囚蔡國昌發聲，伸張了審理上的程序公義。

作為香港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戮力解決難民第二代的生活需求，發展出那個年代所需的教育和福利制度，促進社會整體的自由和愛德價值。雖然徐主教驟然離世，但他的人生路就是不外乎「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sup>50</sup>

徐誠斌主教可謂是一位智者，用理智去審時度勢，以愛德去體察貧乏者的需要，用信心去處理時艱，存望德去展望及策劃未來。他抱着對信仰和真理的熱忱，為自己的人生定位，窮盡一生去活出永恆的普世價值以及人生真義。他看到的是一條天人合一的青雲路，而在這路上行走的，是聖人、是偉人。

## 註釋

- 1 香港史學會：《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 I》（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188—195。
- 2 1880年代初，位於威靈頓街的聖堂面積細小，未足夠應付需要，天主教教會希望建一座比舊聖堂大兩倍的新聖堂。此外，威靈頓街人口稠密，加上附近有妓院，不適合宗教聚會。且1859及1878年發生的大火，波及教堂。舊教堂頂部維修的費用龐大，故出售舊聖堂，以作為興建新主教座堂的資金。見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
- 3 鐵崗，亦被稱為忌連拿利。見何偉傑：〈天主教總堂：葡人對香港天主教的貢獻〉，載丁新豹編：《香港歷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頁83—101。
- 4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
- 5 〈香港聖堂建築簡介〉，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建築探索網站，擷取自 [https://www.catholicheritage.org.hk/tc/introduction/building\\_introduction/index.html](https://www.catholicheritage.org.hk/tc/introduction/building_introduction/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年1月10日）。
- 6 22個葡國人、4個中國人、1個墨西哥人、1個是聖雲仙會。見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
- 7 何偉傑：〈天主教總堂：葡人對香港天主教的貢獻〉，載丁新豹編：《香港歷史散步》，頁83—101。
- 8 聖母無原罪像是在1955年由天主教學生所捐贈，聖母無原罪堂因而得名。到2008年，那聖母像被轉奉到福傳小堂內。
- 9 總堂內的四座小教堂，分別名為聖心小堂、苦難小堂、聖安多尼小堂和聖若瑟小堂，後來改名為聖體小堂、福傳小堂、中華殉道聖人小堂，以及亡者小堂。
- 10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
- 11 *New Standard Encyclopedia*, (Chicago: Standard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1992) pp. C-172-173.
- 12 香港史學會：《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 I》，頁170—195。
- 13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簡介〉，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網站，擷取自 [https://www.catholicheritage.org.hk/tc/catholic\\_building/cathedral/index.html](https://www.catholicheritage.org.hk/tc/catholic_building/cathedral/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年1月5日）。
- 14 譚永亮、夏其龍：《香港天主教教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3。
- 15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130—172。
- 16 譚永亮、夏其龍：《香港天主教教會及傳教會歷史》，頁146—147。
- 17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拉丁語：Concilium Œ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簡稱「梵二」，是天主教會第21次大公會議於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1965年9月14日由次任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 18 柯毅霖（陳愛潔譯）：〈宗座外方傳教會百五年在港傳福音〉，《鼎》，第32卷，總第164期（2012），聖神研究中心網站，擷取自 [http://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64\\_04.html](http://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64_04.html)（瀏覽日期：2019年1月7日）。
- 19 郭神父找來本地人合作，籌組儲蓄互助社，教人儲蓄，做家庭預算，且互相幫助，就不用借高利貸。見〈郭樂賢神父：助人助己的儲蓄互助社創辦人〉，《公教報》，1995年2月17日。
- 20 徐誠斌曾為吳經熊唐詩研究的英文作品《唐詩四季》（*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作中文翻譯，並載於1940年3月的《宇宙風》內。他的文學翻譯造詣，可在《新娘篇》（*Prince's Progress*）中略見一斑。
- 21 據他向朋友透露，做教士是因為「替人赦一次罪，給人內心帶來一點平安，勝過在大學教十年莎士比亞。」〈悼念徐誠斌主教〉（李宏基主教講道詞），《公教報》，1973年6月1日。
- 22 〈悼念徐誠斌主教〉，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網站，擷取自 <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Online%20Exhibition/FX-HSU/Personnal/FXH-001.pdf>（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 23 〈中國主教團追悼徐主教彌撒〉（方豪講道），《公教報》，1973年6月22日。
- 24 〈英坎特伯里大主教藍賽博士週末訪港〉，《基督教週報》，第446期，1973年3月11日。
- 25 〈悼念徐主教息勞歸主〉，《公教報》，1973年6月1日。
- 26 黃信之：〈徐誠斌主教小傳〉，《神學年刊》，第31期（2010），頁1—35。
- 27 林昭寰：〈政府與民間——天主教社會福利組織的角色〉，《天主教研究學報》（創刊號〈梵二會議〉），第1期（2010），頁181。
- 28 當楊鳴章任香港明愛總裁時，曾表示：「白英奇主教、徐誠斌主教、華德中蒙席和力理得神父可說是明愛的四大支柱，沒有他們的努力，明愛不會健康地成長。」見〈服務社群五十載 明愛慶祝成立金禧〉，《公教報》網站，擷取自 <https://kkp.catholic.org.hk/lo/lo3111.htm>（瀏覽日期：2019年1月7日）。
- 29 1968年，教區委任力理得（Francesco Lerda）神父為明愛總裁，直至2003年6月28日逝世為止。期間，他及同僚帶領香港明愛發展。見柯毅霖（陳愛潔譯）：〈宗座外方傳教會百五年在港傳福音〉。
- 30 同上。



- 31 1971年2月，港英政府宣佈調低新入職文憑教師的起薪點，最初級的三級文憑教師的起薪點由1,044元降下調至889元。見權益及投訴部：〈你知道「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嗎？(二之一)〉，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網站，2015年10月5日，擷取自<https://www.hkptu.org/ptunews/17128>（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 32 1972年7月，13個教育團體在中環發起反對新薪級架構的遊行。見同上。
- 33 同上。
- 34 第一輪教師罷工訂於1971年4月4日兒童節，以「為了教育下一代，教師們要以身作則，樹立榜樣，為反對不合理的事情而抗爭」為口號；第二輪在4月13日，即是黑色星期五，為「表達極度的憤怒」；第三輪在5月4、5日，「這兩天是香港舉行升中考試日期，而第一天是五四運動的54周年紀念」，此次罷課勢將嚴重影響約10萬名升中試應考生。見同上。
- 35 權益及投訴部：〈你知道「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嗎？(二之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網站，2015年10月26日，擷取自<https://www.hkptu.org/ptunews/17793>（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 36 謝慧珊、張德蘭：〈文憑教師薪級制的斡旋——訪問徐誠斌主教〉，《公教報》，1973年6月25日。
- 37 張德蘭、謝慧珊：〈認識我們教區的首牧——訪問香港主教徐誠斌〉，《公教報》，1973年5月4日。
- 38 謝慧珊、張德蘭：〈文憑教師薪級制的斡旋——訪問徐誠斌主教〉。
- 39 徐主教說：「我們對現行的升中試制度，並不滿意，不過在未訂出更好的辦法之前，除了支持，沒有別的途徑可走。……請各位老師從大處着眼，支持升中試。」〈四月廿九日文憑教師大會上：徐誠斌主教講話〉，《公教報》，1973年5月4日。
- 40 〈敬悼徐主教〉，《公教報》，1973年6月1日。
- 41 阮美賢：〈香港教會的社會參與及社會訓導〉，載葉麗珊、阮美賢編：《正義道中尋：天主教社會訓導文獻簡易本》（香港：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2006年），頁25-26。
- 42 〈敬悼徐主教〉，《公教報》，1973年6月1日。
- 43 同上。
- 44 〈悼念徐主教息勞歸主〉，《公教報》，1973年6月1日。
- 45 1973年，政府鑑於有112宗謀殺案件，強調要用重典去懲罰罪犯。
- 46 〈七十一人上書英外相請赦死囚原函中文譯本〉，《公教報》，1973年，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站，擷取自<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Online%20Exhibition/FX-HSU/Death/Death-004.pdf>（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 47 〈短評：為什麼要求赦免死囚蔡國昌？〉，《公教報》，1973年5月4日。
- 48 〈五月十九日收到港大文學院一位教友同學的信，講起我在赦免蔡國昌事件中的態度〉，《公教報》，1973年5月25日。
- 49 李東華：〈徘徊於中西文化及基督新、舊教的中心與邊陲——徐誠斌主教的志業與平生〉，《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189-228。
- 50 原文出處為《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語譯：「能夠充分發展自己靈明不昧之本心的人，就可知道自己稟之於天的本性。能夠知道自己的本性，就可以知道天道！保存自己靈明本心而勿失，順養自己天賦的本性而勿害，這就是事天之道呢！生命的長短，絲毫不加疑慮，惟有修養自己的身心以等待天命，這就是立命之道啊！」